

· 综论 ·

历史唯物主义视角下的社会保障基本发展规律

黄冠

[摘要] 本文从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的视角出发，探讨了社会保障的基本发展规律。通过批判性梳理学界对社会保障发展规律的理论解读，明确了生产力进步在社会保障发展过程中的基础性作用，以及对社会保障本源进行更深入探讨的必要性。在回顾社会保障制度演化历程的基础上，分析了工业化和现代生产方式对传统保障体系的冲击。研究认为，社会保障的创设与发展是人类对“安全需求”的社会化和制度化回应，是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变革共同作用的结果。在新的生产力革命背景下，理解这一基本规律有助于构建更加公平、有效和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满足人类共同的安全需求，促进社会的共同发展与繁荣。

[关键词] 历史唯物主义；社会保障；发展规律；工业化；安全需求

一、引言

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出发，本文旨在构建一套经得起推敲和检验的对社会保障基本发展规律的认知。以资源稀缺的现实物质世界为逻辑起点，本研究将人的基本需求——特别是对安全的渴求——视为社会保障制度创设的根本缘由，把生产力作为社会保障制度设计和发展的现实基础，梳理在现代社会保障形成前的相关制度尝试和经验积累过程，由此推导出社会保障发展的基本规律，以期能为新质生产力进步背景下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与创新提供更符合现实逻辑的参考。

虽然早在中国北宋王安石变法时期，就已经可以观测到相对原始的社会保障制度萌芽，^①但直到近代工业革命后的普鲁士俾斯麦执政时期，才在制度层面建立起社会保障的原型系统。二战的爆发，迫使英国政界和学界为对抗纳粹德国的战争国家（Warfare State）而开启了对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的概念建构和理论探索，但社会保障真正引起学界的普遍关注却是在二战后的资本主义“黄金年代（Golden Age）”。

这种滞后现象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现代社会保障是作为人类世界工业化发展的副产品出现的，以至于对社会保障发展规律的经典解读都被冠以“工业化”之名。依据工业化理论，现代社会保障诞生的原因在于工业化生产打破了农业时代基于“核心家庭”和血缘社群的保障体系，引发了新的社会风险和社会分工。公权力机关、经济组织和社会团体出于维系国家

[作者简介] 黄冠，常州大学瞿秋白政府管理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社会保障理论及制度演化。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社会保险制度优化研究”（24BSH171）；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新业态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问题研究”（23JZD020）。

① 张文等：《贫困认知与宋朝社会保障的逻辑转变》，《山东社会科学》2017年第7期。

安定发展的需要,不得不回应工人群体的生产和生活保障需求,进而引入了社会化的保障项目,促成了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诞生。在此视角下,工业化发展程度越高的国家,经济越发达,社会保障制度也往往越完善,从而让学界观测到了社会保障发展与经济成长正相关的现象。这也催生了“社会保障水平需要与经济发展程度相适应”的通俗说法,但这显然是基于特定历史时期现象的归纳性的片面认识,未能全面准确概括学界对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复杂关系的理论解读,忽视了政治、文化、历史等更深层因素的影响。

与上述诞生于政治学视角下的社会保障基本发展规律解读不同,经济学家将社会保障理解为经济体的一项功能性机制,在关注经济与社会保障之间的互动关系的同时,更注重通过量化和统计方法,来探究和检验实现社会保障机制建设和运营的经济有效性背后的规律性特质和相关假说。与之相较,社会学更倾向于将社会保障界定为社会的一种子系统,进而研究社会如何形塑社会保障系统,以及社会保障系统运营产生的社会性后果。社会学家习惯于从需求层面出发,运用调研数据来归纳社会保障系统演化的社会性根源和变革机制。

尽管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学科均基于它们对社会保障的不同认知和界定给出了对社会保障发展的规律性解答,但是,一方面,不同学科对社会保障发展的规律性解读仅反映社会保障在特定学科视角下的特定历史时期中的规律性发展特征,仅揭示了社会保障基本发展规律的某个侧面,缺乏全景型理论认知;另一方面,虽然不同学科从制度演化历程中发掘出的规律在应用层面解答了社会保障的发展,但其逻辑基础仍是植根于对历史现象的归纳,以归纳逻辑推导出的理论和规律极易陷入对特定时期历史现象的总结,它们是否真正反映了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基本规律,不仅需要后续的实证检验,还需要基于演绎逻辑的论证。这就引出了本研究的任务:从现实出发,探究社会保障制度作为人类群体对安全这一基本需求的制度化回应,如何在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产生和演进,并论述其在未来生产力飞跃背景下,发展成为人类世界新的独立活动领域的可能性。

二、历史唯物主义视角下的研究方法 with 理论框架

本文在探究和论述社会保障基本发展规律时,采用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确保理论分析具有坚实的哲学基础和科学性。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认为社会历史的发展是由物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决定的。立足这一基本原理,本研究聚焦于生产力发展与人的本性需求这两个源头变量,系统探讨了社会保障制度起源、演进与创新背后的哲学逻辑。

在研究方法层面,首先,历史唯物主义为分析中国及全球社会保障制度的历史演变提供了总体视角。它强调从物质生产和经济基础出发理解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通过梳理生产力发展水平与社会保障形态之间的对应关系,揭示社会保障制度出现和变迁的历史必然性。^①其次,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继承并发展的“奥卡姆剃刀”所蕴含的“反对不必要假设,追求最简明解释”的理性精神,本研究在初始假设设计上遵循“如无必要,勿增实体”原则,推定人类世界任何制度体系的创设和存续均源于满足特定需求的必要。同时,在分析中也遵循“奥卡姆剃刀”原则,将社会保障制

① Harold L. Wilensky, Charles N. Lebeaux, *Industrial Society and Social Welfare*, Russell Sage, 1958, 281-337.

度的本质简化为对人的“安全需求”与“物质基础条件”的双重回应，强调理论的逻辑简约和普遍解释力。再次，立足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本研究系统评议和反思现有主流理论流派，包括趋同论、分化论、全球化及性别革命等视角，并结合国内学界对社会保障发展规律的探究，^① 借以凸显从历史唯物主义哲学视角出发的对社会保障基本发展规律的探究的理论优势和现实指导性。

如图 1 所示，在理论分析框架上，历史唯物主义视角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生产力基础论强调社会保障制度的产生与演进根植于社会物质财富的不断积累和生产方式的变革。社会保障经历了由私人 and 家庭互助到社会化、国家化，再到新技术变革推动下的独立“保障”领域的历史演进，每一发展阶段均与生产力水平密切相关。第二，基本需求驱动论强调人的“安全需求”是社会保障制度创设的根本动力，而制度化的社会保障则是在生产力支持下，使人类本能的“安全需求”得以大规模满足的机制创新。^② 第三，本理论框架采取了“需求-生产力-制度形态”三元互动模型，揭示出社会保障的执行形态是受制于物质基础的，同时也是人的主观需求和制度设计能力共同塑造的。第四，对现有理论流派进行梳理，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出发，对解读社会保障发展规律的理论主张进行批判性综述，认为理论创新不应只限于经验层面的归纳，还需从人的本能需求和社会物质条件的辩证统一中回应和升华。此外，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视角和方法论，本文认为社会保障制度在新质生产力及数智社会环境下有望进一步突破在现行经济体系中的派生地位，成为人类社会直接配置与再分配财富的独立的重要活动领域，并如经济和社会两大活动领域一般，逐步从回应和满足人的某项基本需要，升华为支持人的全面发展和自我实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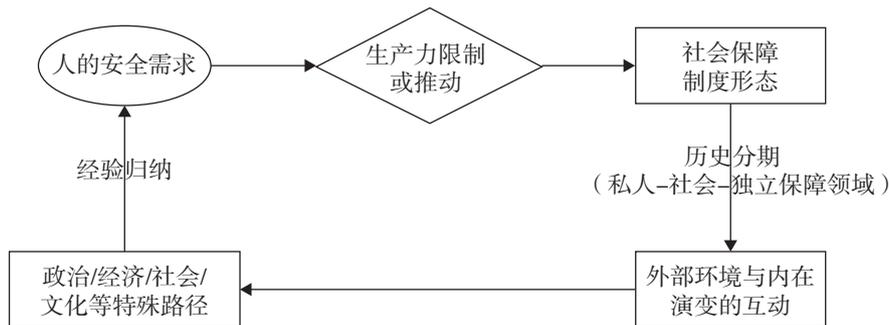


图 1 历史唯物主义视角下社会保障发展规律理论分析框架的简化模型

综上，历史唯物主义视角下的理论分析框架以生产力发展为前提条件，以人的“安全需求”为逻辑起点，通过历史分期与三元互动模型，对主流理论流派加以梳理与提升，既推演了社会保障的基本发展规律，又明确了进一步推进理论创新的方向。此框架为理解中国乃至全球社会保障制度的演变提供了系统且具前瞻性的理论支持。

三、学界对社会保障基本发展规律理论解读梳理

社会保障制度作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构建、运行及演化规律始终是国内外学界密切关注的学术焦点。随着全球化、人口结构变化和技术进步，社会保障制度不仅被视为社会风险分担和财富再分配的重要机制，其本身的运行逻辑、演变动力和结构创新也成为

^① 郑功成等：《全球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关系：回顾与展望》，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19年，第17-20页。

^② 黄冠：《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视角下：社会保障学再认知》，《理论月刊》2024年第6期。

研究的核心议题。在国际学界对社会保障发展规律的理论探究取得长足进展的基础上,中国学界结合本国社会结构、文化传统和治理现实,对社会保障发展基本规律的发掘也进行了本土化理论创新,努力实现对国际学界关于社会保障发展规律理论研究体系的积极回应与超越。^①

(一) 国际学界对社会保障发展规律理论探究的批判性解析

1. 结构功能主义与风险社会化

国际学界对社会保障制度发展动力的探析,首要缘于结构功能主义的阐释。Wilensky 与 Lebeaux 在对福利国家形成与发展逻辑的分析中,提出在现代化过程中由工业化所导致的人口变动和社会分工催生了大量不能依靠个体或家庭独自承担的风险,国家层面的社会保障制度应运而生。^②该理论流派学者们进一步整合了产业社会背景,通过对美国等先行发达经济体的社会福利的实证研究,阐释了社会保障是社会风险外部性扩散情况下的理性应对机制,不仅关涉到救助与救济功能,还是维护社会稳定与秩序的制度安排。因此,社会保障的发展被认为是由经济增长、生产力提升、人口结构变化(如老龄化)等“现代性变量”驱动的,各国社会保障制度终将趋于相似的架构和功能形态。

由此奠定了国际学界解析社会保障发展规律的两大理论流派之一的趋同论(Convergence Theory)的关键研究基础,即立足于经济基础与社会结构演变。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看,趋同论抓住了生产力(经济增长)与社会保障规模的关联,这与生产力决定社会存在的基本原理相符,但其局限在于未能揭示生产力作为更深层决定因素的逻辑,也未能充分解释制度形式的多样性,更多的是基于特定历史时期现象的归纳而非基本规律的演绎。

2. 权力资源理论与制度分型

对于社会保障制度结构与类型的多样性,Esping-Andersen 提出了著名的分型理论,即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三类与广义社会保障相关的制度模型。^③他指出,各国制度分化的根本在于阶层结构、利益集团权力分布及政党组成等政治力量格局,而社会保障制度的形成和调整是社会结构与政治资源互动博弈的结果。Myles 和 Quadagno 则进一步强调,社会保障体制的发展不仅取决于现实政治竞争,更受历史遗产及路径依赖影响,任何改革和转型往往植根于既有政策框架和利益格局中。^④

由此诞生了国际学界解读社会保障发展规律的另一理论流派:分化论(Divergence Theory)。该理论流派主张社会保障的形成与演化受到政治结构、权力资源配置、文化传统及历史路径依赖等多重变量影响,致使各个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设计和路径均存在显著差异,且缺乏统一范式。显而易见,分化论揭示了上层建筑(政治、制度)对社会保障形态的具体影响,但将政治、制度因素置于核心地位,忽视了物质基础的根本决定作用,同样是基于特定国别或历史背景的归纳,未能触及社会保障产生的最根本动力。

3. 历史路径依赖与渐进式调整

对社会保障发展规律的研究在20世纪后期引入了全球化、后工业经济转型和性别革命等新变量,进一步检验了趋同和分化两派理论主张的稳健性。全球化加剧了国际竞争和资本流动。

① 郑功成:《社会保障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3-28页。

② Harold L. Wilensky, Charles N. Lebeaux, *Industrial Society and Social Welfare*, Russell Sage, 1958, 11-27.

③ Gøsta Esping-Andersen, *The Three Worlds of Welfare Capitalis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7-33.

④ 黄冠:《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视角下:社会保障学再认知》,《理论月刊》2024年第6期。

一方面，全球化加剧了国际竞争，引发了各国对社会保障待遇竞相“逐底”的担忧；另一方面，为呼应和便利产业跨国布局和人员流动，各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制度对接和待遇对标也不可避免。为应对这些变化，一些先进民主国家面临减少公共支出的压力，而其他国家则通过制度机制维持、甚至增加社会保障支出，以调节全球化的不利影响。通过对发达经济体应对资本全球化流动和税收转型问题的研究，发现社会保障改革通常受制于各方利益主体在现有制度安排下展开的竞争和妥协，具有显著的路径依赖性质。

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以及“后工业化”浪潮下，社会保障不再仅仅以财富再分配为功能目标，还承载着稳定市场、增加社会包容性等功能，表现出更加复杂的适应性与层次分化。这意味着，即使面临变革压力，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也往往表现出渐进性和差异化，历史形成的制度惯性难以被彻底颠覆。这些研究发现虽然展示了全球化、后工业化、性别革命等新涌现的变量在解读社会保障发展中的价值，补充了特定影响因素，但也是对既有制度适应性调整的描述，未能从生产力与人类需求互动的深层逻辑出发，触及社会保障创设的本源和基本发展规律。

（二）中国学界的本土理论创新与发展

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历史演化和理论建构显著区别于西方，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底蕴和家国组织特性。中国学界对社会保障发展规律的探究更具基础性，试图从更根本的基础层面挖掘社会保障诞生、存续和发展的动因。已有的研究形了解读社会保障发展的多重理论路径。具体来说，从“家国一体”视角出发，对中国传统社会保障发展进行系统的文化溯源，发掘出的国家责任和家庭责任交织不仅为社会保障体系提供了本土化正当性，而且满足了中国社会追求稳定、整合和基本公平的历史文化需求。国家在中国社会保障体制中兼具经济保障者和社会秩序维护者的角色。^①更进一步，通过剖析“孝忠一体”的伦理逻辑如何塑造了中国社会治理和风险分担的基本方式，发现中国社会保障模式既承袭了传统家族对个体责任的高度重视，又通过政治权威实现了家国结构的统合，形成“家国同构”的社会安全网。这一模式强化了家庭与国家的协同，共同承担养老、医疗、抚幼等社会保障职责。^②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郑功成等学者对中国社会保障发展规律进行了系统性研究。他们强调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构建与改革必须立足中国国情，遵循“全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方针，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辩证处理公平与效率、国家与市场、政府与个人的关系。^③郑功成认为，中国社会保障的发展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国家发展战略与社会需求的有机结合，既体现了普遍规律，又有鲜明的中国特色。^④高和荣以“底线公平”和“共同富裕”为理论基点，对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内生原则和现实目标做出解释。^⑤林闽钢关注社会保障“系统集成、协同高效”的具体机制，强调国家、市场、社会、个人多元动力机制的协同。^⑥席恒为社会保障体系的现代治理提出了多制度、多主体整合、新技术赋能（如数字化治理）等创新路径。^⑦

① 林闽钢：《“系统集成、协同高效”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以长三角社会保障一体化为例》，《社会保障评论》2022年第3期。

② 俞可平：《孝忠一体与家国同构——从丁忧看传统中国的政治形态》，《天津社会科学》2021年第5期。

③ 郑功成等：《全球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关系：回顾与展望》，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19年，第21-33页。

④ 郑功成：《中国社会保障70年发展（1949—2019）：回顾与展望》，《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9年第5期。

⑤ 高和荣：《底线公平：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内在根据》，《社会科学辑刊》2016年第3期。

⑥ 林闽钢：《“系统集成、协同高效”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以长三角社会保障一体化为例》，《社会保障评论》2022年第3期。

⑦ 席恒：《适应数字经济发展的社会保险改革与完善》，《社会保障评论》2025年第1期。

中国学界对社会保障发展规律的研究发现,一方面是具有普适性的,即现代社会结构复杂化导致的风险高度社会化,要求国家对个体和家庭承担的风险进行社会化分担。^① 社会保障制度本质上是满足人类对安全保障与基本生活保障需求的体制安排。^② 另一方面,中国的实践路径强调“系统集成”,以共同富裕目标统领多层次社会资源配置。中国社会保障体制建设在汲取传统家族与国家责任的基础上,逐步推进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制度整合。^③ 这些研究发现表明国际学界理论对中国社会保障发展实践具有一定解释力,更为理解社会保障发展规律提供了新的历史和文化视野,契合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要求。

总体来看,国内外学界理论流派为社会保障制度发展规律的结构归纳与机制分析储备了大量知识,但在对社会保障诞生与发展的人性本源方面的探究存在缺失,致使对社会保障基本发展规律的探究仍亟需补充哲学层面的理论解读,以此来破解在社会保障理想形态以及应对未来人类世界变革方面的研究局限。本研究结合哲学抽象与历史演绎,从本源逻辑、实践历程、前瞻性路径三重维度出发,以人性需求为内在动因,以生产力水平为物质基础,揭示制度生成、演化与创新的“内在动力”,提出了社会保障基本发展规律的新解释路径。这不仅从理论深度和广度上丰富了社会保障学科体系,也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及社会保障理论创新提供了一种新的探索方向,有助于提升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理论自信,并推动实践创新。

四、从渴求“安全”到创设“社会保障”：历史唯物主义的演绎

(一) 社会保障创设发展的哲学演绎

“生老病死”是人类与生俱来必须要面对的超出个人自身能力应对范围的风险或非正常状态。应对这类非正常状态的需要,可以被理解为人类集结成群的基础动因之一。繁衍的本能结合应对非正常状态的需要,使人类在集结成群后,在不断试错过程中,逐渐摸索出了最具“性价比”的私人保障模式,即结成稳定家庭乃至家族。^④ 尽管在前现代化时期维系这种私人保障模式的纽带是血缘关系,但无论中外,历次统一国家时期均能观测到对公共性保障的制度尝试,例如古希腊和罗马的共餐、《小麦法》《儿童福利基金法》、保障就业的公共工程,以及中国宋朝的救荒、济贫、扶弱等公共性保障制度。这表明虽然前现代时期以私人保障为主,但是人类从来没有将保障限定在私人领域,对构建公共保障的尝试和努力也从未断绝,只是前现代的低下生产力条件限制了人类对于保障制度的建设。直到工业革命带来了生产力提升,开启了以工业化为主要生产组织方式的现代化进程,社会化的工业生产带来了人的社会化,从而驱动人类对保障制度的建设也走上了社会化的道路,进而催生了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出现。换言之,社会保障的实质就是用正常运转的社会,来保障遭遇危机的人生。

马克思认为,“需求”是人的本质属性。^⑤ 在透过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对社会保障的发展进行溯源后,遵循“如无必要,勿增实体”的“奥卡姆剃刀”原则,人类采取任何行动和创设制

① 林闽钢:《中国社会保障学知识体系论纲——基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视角的考察》,《社会保障评论》2024年第1期。

② 黄冠:《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视角下:社会保障学再认知》,《理论月刊》2024年第6期。

③ 郑功成等:《全球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关系:回顾与展望》,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19年,第67-110页。

④ 王玉改:《中国家庭风险保障体系》,《保险理论与实践》2025年第3期。

⑤ 余永跃等:《马克思“人的本质”思想解读》,《光明日报》,2006年6月26日第9版。

度工具均应源于特定的需求，那么从理论层面对社会保障本源的探究，就可以从人类的基本需求展开。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假说将人类的基本需求按照从高到低分为五个层次：“生存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①与之相应，人类在“私人”领域中从事经济活动来谋生，以满足基本的“生存需求”；在“公共”领域中从事政治活动来追求永恒，以满足基本的“自我实现需求”。生产力进步引发的工业革命促成了既非公共也非私人的第三领域——“社会”的独立，不仅为人类提供了从事社交活动的领域，还满足了基本的“社交需求”。^②上述三个领域的存在不仅分别对应了马斯洛所论述的人类五项基本需求中的“生存、社交和自我实现”，同时也表明随着生产力的进步，人类的各项基本需求均具有在人类世界中衍生出独立活动领域的可能性。

遵循上述理论思路，结合人类寻求保障的历史历程，可以推定，“生老病死”这些人生中的非正常状态所威胁的正是人类“安全需求”的满足。人类对于“安全”的追求贯穿了整个人类历史，小到微观的个人储蓄和扶老携幼，大到宏观的跨阶层资源分配和跨地域资源配置，无不展现着为满足“安全需求”而衍生的行为范式和制度模式。归结起来，由“安全需求”而衍生的行为和制度所发挥的核心功能的实质就是对安定时期和先发地区积累的资源财富进行“再分配”。在生产力的现代化发展后，这种“再分配”的专门化和制度化表达造就了现今广为人知的社会保障，但社会保障并不是人类为追逐“安全”而创设“再分配”行动和制度工具的最终形态。正如为满足其他基本需求均衍生出了独立的人类活动领域，对于“安全”的追逐，在未来随着生产力的进步，也必然衍生出以“再分配”为核心功能的可以被称之为“保障”的独立活动领域。

如图2所示，以人类基本的“安全需求”为起点，起初风险均担的“联保”行为同人类的求生活活动混合出现，驱使人类结成家庭、部落以致国家。随着工业革命带来的人类生产力快速发展，与人类生产生活的社会化同步，谋求安全的“联保”行为也走入了“公共”领域，逐步成为政治主导下的社会保障系统。如今，在数智技术引领的新质生产力进步的背景下，社会保障系统显然将进一步成长为“保障”人类安稳可持续发展的独立再分配系统，而这也恰恰契合了习近平总书记对社会保障体系发展建设提出的“系统集成、协同高效”的要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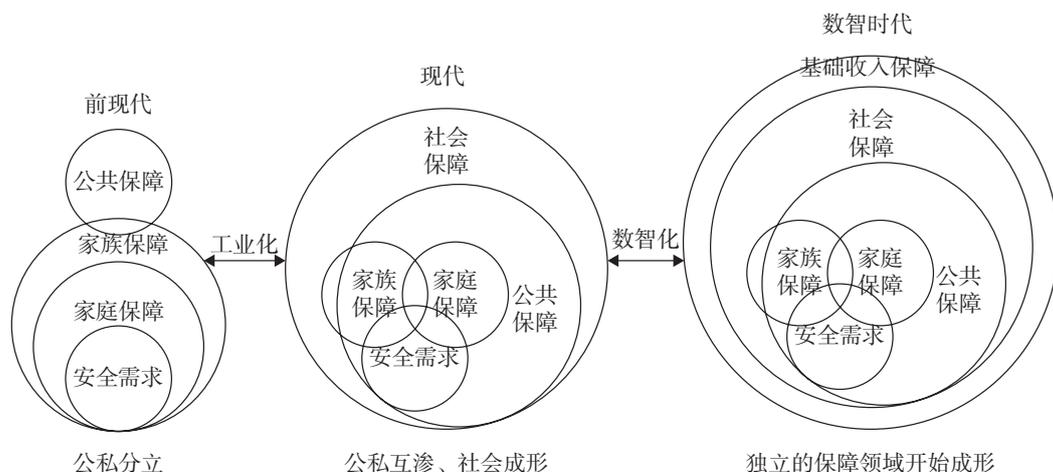


图2 “保障”视角下的从古到今再到未来的人类生活领域演进图

① 竺乾威等：《公共行政学经典文选（英文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107-131页。

② Hannah Arendt, *The Human Conditi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8, 21-40.

（二）社会保障发展的历史演绎

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推演社会保障的发展，可以发现，在人类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渔猎采集时期，以群体劳作为主体的生产方式，不仅难以确立对劳动产品的明确产权，进而让“分享”成为主要的劳动产品分配方式，还造成了对群体成员的“生老病死”的保障水平极端低下。除了生产过程中的必要合作，整个群体并未形成分担成员在日常生活中的风险的概念，非普遍性的互助行为多是出于动物本能的随机性反馈。整个群体虽然在获取基本物资和抵御外部侵袭方面结成了稳定的生产合作，但是在应对日常生活中的“生老病死”方面并未形成清晰的群体共担认知，使得人类的“安全需求”仅在最低的应对外来侵袭的水平上得到了保障，且均为自发行为，未形成制度化的规定。

在人类发现并习得农耕和放牧等生产技能后，生产方式的变化造就了清晰确认劳动产品的产权的基础可能，由此逐渐形成了以生产资料和劳动投入为基准的劳动产品分配方式。这一方面确立了以私有产权为主的所有制在生产关系架构中的基础地位，另一方面也使应对“生老病死”的风险进一步成为私人事务。在人与以土地为主的生产资料绑定的生产关系中，为满足人类基本的“安全需求”，“血脉”作为现代社会制度建立以前最具约束力的人际联系，成为了人类自发形成互保基本单元的纽带。由此形成了以“核心家庭”为基本单位的经典的生产和保障组织形式。在这一历史时期，保障行为主要发生在由“血脉”维系的家庭和家族之中。尽管在由血脉扩张衍生的政权架构中也存在某种形态的公共保障，但是这些保障依旧停留在最基础的“维生”水平，并未实现超越私人化生产组织形式的社会化保障。

随着以“工业革命”为标志的生产力跃进，工业化的扩散改变了此前人与以土地为主的生产资料绑定的生产关系，工人与岗位的绑定成了新生的工业化生产关系的主要标志。在工业化大生产破坏了传统的核心家庭的生产和保障组织模式，使生产力走出家庭，提高了人群流动和互动的同时，也增强了非血缘关系的人群之间的稳定联系，带来了与社会化大生产相伴的人类生产生活的社会化。如影随行的，旧农牧时代基于核心家庭的保障模式被打破，人类生产生活过程中面临的风险形式和烈度均超过了家庭的保障能力，为此人类世界不得不建立起与社会化的工业大生产相匹配的满足人类安全需求的社会化保障制度。对这一历史时期的回顾可以发现“保障”被不断社会化的清晰过程，从最初的基于企业互助会形式的自发保障项目，到以行业为基础的全行业就业人员参加的保险项目，再到由公共权力机关组织运营的制度化的社会保障项目，现代社会保障不但从对保障健康劳动力供给最关键的医疗和养老项目，逐步扩张成包括多种功能的综合性的覆盖全体民众的保障体系，还将曾经属于私人责任的家庭保障转化升级成了一项基本人权。^①

通过对社会保障一般性演化进程的历史分析，可以发现作为自变量的人的“安全需求”是作为因变量的社会保障发展变化的原初动力，而生产力水平在整个过程中发挥了条件变量的作用，与之联动的生产关系，尤其是其中的就业形态的变化则作为中介变量直接影响了社会保障架设的具体制度表现。遵循从生产力进步到就业形态转变再到社会保障模式升级的历史唯物主义发展脉络，以人类“安全需求”的内容在新的生产力进步带来的冲击下必然发生改变为推演起点，在新质生产力成为发展支柱，后工业经济时代来临，以“众包”为代表的新就业形态不断涌现和持续扩散的情况下，社会保障的制度架构和设计势必要做出相应调整和升级。

^① 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联合国官网：<https://www.un.org/zh/about-us/universal-declaration-of-human-rights>。

五、新质生产力背景下的社会保障发展前瞻

理论研究的根本动因是为了发掘、理解和掌握事物的规律，而把握规律的根本目的是预测未来，从而指导人类的社会实践。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表明，物质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当前，以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等智能技术引领的“新质生产力”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新的经济基础正在形成。这必然对包括社会保障制度在内的上层建筑，产生深刻影响。因此，运用通过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框架推演所得的社会保障基本发展规律，来理解新质生产力对社会保障的影响，是理论研究的必然要务。

历史上的每一次技术进步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无不经历了“提高效率－冲击产业秩序－变革社会形态－人类社会进步”的长期演进过程。从历史的长周期来看，技术进步的前景几乎一定是光明的，但令人遗憾的正是凯恩斯所说的“长期来看，我们都死了。”因此，当我们讨论人与技术进步关系问题时，必须优先解决的是技术进步与当下人类的关系问题，尤其是如何应对技术进步带来的分配挑战和新的不稳定性。

新质生产力进步已经打破了现有经济系统实现均衡分配的能力，技术进步带来的超额利润或“技术租金”难以在现有分配机制下达成社会层面的公平。同时，伴随着传统形式的劳动在价值创造中占比的相对下降，对新就业形态导致的风险社会化防范不足等系列问题也开始涌现。尤其是在人工智能技术和依托互联网技术生成的以“共享经济”“数字经济”为代表的新商业模式加持下，人类活动本身（如生成数据、构建平台生态）成了最重要的经济资源，由此衍生的成本社会化和收益私有化之间的矛盾已经开始出现。

在此背景下，一方面，在现有的公共、私人和社会三大领域中以传统劳动参与为基础架设的财富分配机制面临挑战。要杜绝依托新技术攫取“租金”造成的收入差距拉大，重新实现人类世界运转的均衡状态，不仅要依靠经济领域的初次分配，还需要对再分配职能进行全面升级。这势必带来现有的社会保障制度的革新，这种革新所指向的起点是在现有框架内对保障功能进行根本性强化和重构，而终点必然是源于人类“安全需求”的“保障”领域的独立。

另一方面，随着本轮智能技术引领的生产力进步，人的生产生活的社会化程度愈发提高。在新就业形态下，雇员和雇主的关系出现模糊，雇员应更多地被视为以新型生产要素（如数据、算法）参与生产的资产投入者，那么企业法人就应承担与雇员的技术和数据投入带来的利润增长相匹配的社会保障责任并分配收益，以此来补偿被转化为企业资本的雇员劳动技能和数据的贡献。在新就业形态下，要实现社会财富的均衡分配，势必要通过税收对企业超额利润进行征缴，再由财政对这部分超额利润进行转移，并最终以社会保障的形式惠及全民。这不仅意味着社会保障支出与个人缴费的脱离，而且在对社会保障进行普惠化改革的同时，还要辅以“全民基本收入”（UBI）等非基于传统雇佣关系的分配制度的大量创设和主体化发展，从而充实“保障”这一领域的制度架设，推动其成为独立的财富分配系统。

本文不仅论述了独立的“保障”领域出现的可能性和逻辑依据，更指出该领域将重新调整和创设非经济体系的再分配制度，以满足人类在新风险模式下的“安全需求”。在这一过程中，契合实现新质生产力带来的新财富在各行业和各群体之间合理分配的需要，社会保障体系需要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系统集成、协同高效”要求指导下，从现有的主要追求公平公正地进行社会财富再分配并提供应对社会风险的保障，升级成支持人的全面发展和应对复杂风险的制度。

Basic Development Laws of Social Secur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Huang Guan

(Qu Qiubai School of Government, Changzhou University, Changzhou 213159,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basic development laws of social security from the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By critically reviewing theoretical interpretations in existing scholarship, it clarifies the foundational role of productive forces in driving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security and highlights the necessity of further investigating its origins. Drawing on a historical review of the evolution of social security systems, the paper examines how industrialization and modern modes of production have challenged traditional security arrangements. The study argues that the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social security represent the socialization and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human security needs, shaped by the combined forces of productive development and transformations in social relations. In the context of a new wave of productive force revolution, understanding these basic laws is crucial for building a more equitable, effective, and sustainable social security system—one that meets universal human security needs and fosters collective development and prosperity.

Keyword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social security; development laws; industrialization; security needs

(责任编辑: 郭 林)